

道法自然

道家的管理智慧



张应杭 编著

国

史

句

社

机
正
初
印
制
书

自序

以佛家的话说是一种因缘际会，一九九七年我以『边缘人』的角色进入了此前从未想到会涉足的管理学领域。多少让我有些始料未及的是，在管理学的丛林中我却因着无心插柳而拥有了自己的一方领地。几近十年的不懈劳作，我的『儒、道、禅与现代管理』课程渐渐地得到了学界和业界的认同。这些年，我不仅在上海大众、红蜻蜓、西子奥的斯、LG等十多家企业作过培训，而且应邀在电视台的『名家论坛』中讲授《东方智慧：儒、道、禅与现代管理》的系列课程，反响颇为热烈。这套《国学》中的管理智慧》可以说是应出版社约请以文字的形式继续讨论这一话题的续篇。

记得一次在北京大学讲学时曾接受某记者的采访。在回答她『如何看待管理培训中的国学热』这一问题时，我谈了两点看法：从宏观背景看这和当前我们开始重视民族精神的培育和弘扬相关。一个民族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不可能没有自己民族文化的根本和魂，而它往往就积淀在『国学』中。从微观背景看，中国企业发展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如何将『西学』本土化的问题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紧要关头了。否则，我们就永远只能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因此打造中国特色的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途径当然很多，但是，从传统管理之道中汲取智慧的营养显然是很重要的一条途径。事实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和业界人士在作这方面的努力。因为中国古代以『道』为尊的管理智慧的确可以为现代管理提供一种东方式的思想营养。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以儒、道、禅为代表的传统管理智慧对现代管理者人格修炼修为还尤其凸显其清明的指引意义。

我以为今天的中国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必须有效地抵御来自两方面的诱惑：一是做企业过程中市场经济必然内含的利润最大化法则的诱惑；二是做人过程中刚性递进的财富占有欲的诱惑。而向以『义利合一』为最高价值取向和『中庸唯美』（儒）、『自然无为』（道）、『空观』（禅）为处世之道的传统文化无疑为我们在这疑惑面前拥有一份定力，从而守持住一颗道义之心提供着诸多的智慧指引。因此，这些年来我始终认为，极易在市场经济锱铢必较的拜金主义，甚至声色犬马的诱惑中迷失自我的现代人，极其需要儒、道、禅智慧之光的理性烛照。

需要申明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作者在这里所阐发的只是沧海一粟。正文中之所以用『九大智慧原则』来编排也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因为在《论语》、《道德经》和

《坛经》作为一个重要内容放在正文里进行导读，无非是想让大家能够原汁原味地感受古代经典的现代魅力。末尾所附的『主要参考文献』既是我写作本书时大量借鉴其思想的范本，同时也是我向读者诸君提供进一步阅读的一份大略书单。

惟愿读者诸君能够开卷有益。

谨以此为序。

张应杭

二〇〇六年七月二十日于浙江大学西溪校区

目 录

【道家概况】

老庄和道家

以『道』为尊的中国哲学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中对宇宙人生问题之最高智慧——『道』的探讨，隽永深邃，韵味无穷。在先秦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时代，曾涌现出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名家、兵家、农家、阴阳家等等。诸子百家各引一端，崇其所好，对『道』的研究自成一统。而道家对『道』的探求尤其为后世所瞩目。后世把以老子和庄子关于『道』的学说为宗旨的派别通称为道家。

儒道互补的中国传统文化

儒道两家思想，一个刚健有为，一个因循自然；一个入世进取，一个潜隐退守。但这正是他们达到相通和互补的前提。所以，许多中国古代文人入世为儒，出世为道，或者熔儒道于一炉，张弛相济，进退自如。

道家智慧的当代价值

道家文化的现代意义不仅从『道法自然』这一最高的价值观上给现代人走出全球问题困顿指出了清明的出路，它也还体现在解决这一困顿的具体启迪方面。譬如『天人合一』思维模式对于保护当代生态平衡；『无为而治』、『有无相生』和『正言若反』的求异思维对于克服西方管理过分机械的弊病，从而建构东方式的管理模式等，都有极为重要的智慧启迪意义。

【道家管理智慧的九大原则】

道法自然

遵照『顺其自然』的道家智慧，效法『自然无为』之『道』的人类，至少应该谨守如下三大管理原则：一是自然地对待自然。我们对于自然界的态度应是：不妄加干涉，不破坏生态平衡，从而让它保持一种自然和谐的状态。二是自然地对待他人。这是人和平相处的基本原则，也是道家给出的如何保持团队精神的最根本的智慧原则。三是自然地对待自己。这是现代人摆脱物欲的纠缠而拥有云淡风轻之自然心境的处世智慧。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六〕

〔一〇〕

〔一二〕

〔一二〕

关于道家的『无为』思想我们通常有一个望文生义的误解，以为『无为』就是『不为』，其实这是一个流行的谬误。作为一种管理智慧，道家的『无为』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是『有所不为』。这亦即是说，『无为』的管理理念在这里意味着『有所为』和『有所不为』，这是一种管理哲学上的辩证统一之道。它在我们的管理实践中所揭示的是：只有『有所不为』才可能真正『有所为』。

为而不争

尽管道家『不争』思想的消极方面也是很明显的，因为这种处世哲学常常会成为许多人明哲保身、孤芳自赏的借口。但其谦下不争的处世原则对于今天的社会仍不失其借鉴意义。置身市场经济的现时代，我们固然需要认同竞争，但同时也应当提倡道德上的利他主义原则，提倡人与人之间的宽容，提倡在个人名利面前的谦让与不争。

正言若反

道家这一『正言若反』所揭示的事物相反相成的道理，对于具体的管理实施而言也无不启迪。事实上，无论是行政管理，还是工商企业管理其实都必然地涉及诸如有为与不为、集权与分权、权威与服从、物质刺激与精神激励以及刚与柔、亲与疏、上与下、动与静、进与退等等诸多的矛盾。道家在这里的管理智慧明确主张相反相成、相辅相生。

反者道之动

道家的这一『反者道之动』的辩证思维，作为一种管理哲学的基本理念，其意义无疑是深远的。对于管理决策而论，它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思路，即相对的事物一定是向对立面的方向转化的。因此，管理者必须善于从对立统一的变化中科学地预测事物的发展变化规律，从而才能做到处变不惊，进退自如。

由虚而静

由虚而静从本质上讲是道家主张的对人的躁动欲望进行有效控制的管理智慧。在老子看来，一旦治国者能真正教民以虚静之道，那么，天下百姓就能由虚而静，从而达到以静治国。以老子的话说就是：『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清静为天下正

好的导演不代演员演戏，好的企业家不越俎代庖。领导者务虚，考虑一切超越于日常事务之外的指导思想、未来目标等问题；执行者务实，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地贯彻管理规则，处理日常具体事务。而这正是道家『清静』之道的实践要义之所在。

〔六八〕

贵柔守弱

世间万物，孰为最强者？老子认为是水。水滋润万物，性柔弱，在方为方，在圆为圆，去高就下，委屈自然，可谓柔之至、柔之极。然而水斩关夺道，决堤冲坝，穿石毁物，无坚不摧，无所不至。因此，在老子看来，水简直就是道的化身。『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故几于道。』

〔七六〕

见素抱朴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这种见素抱朴、以俭养身的思想，积淀于民族精神之中，对后来的中华民族历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诸葛亮在《诫子书》中即谆谆告诫其子：『静以养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八四〕

【道家经典】——《老子》选读

〔八四〕

《老子》概述

如果说要了解儒家思想我们不可不读《论语》的话，那么，要了解道家学说的源与流，我们就必须认真研读《老子》一书。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在这部分为『道经』与『德经』的著述中，既探讨了自然无为的『道』，也尊『道』崇『德』，进而论述了作为人安身立命之本的基本德性原则。它不仅千百年来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而且也在『东学西渐』的过程中日益凸现其全球性的价值。

〔九〇〕

《老子》原文、注释和今译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微。两者同出，异名同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一八七〕

【主要参考文献】

一、道家概述

以『道』为尊的中国哲学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中对宇宙人生问题的最高智慧之『道』的探讨，隽永深邃，韵味无穷。在先秦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时代，就曾涌现出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名家、兵家、农家、阴阳家等等。诸子百家各引一端，崇其所好，对『道』的研究自成一统。这其中道家对『道』的探求尤其为后世所瞩目。

在百家争鸣中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学派提出了『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的最高存在原则和『惟道是从』（《老子》二十一章）的人生智慧原则。在老子看来，『道』作为宇宙万事万物包括人事在内的一切存在的最高最普遍的规律，是人所必须遵循的必然之则。而『道』的本质是无为，因而作为对道的一种自觉遵循，人的德性也应崇尚无知、无欲、无为。老子的《道德经》中阐述的正是这样一个尊『道』崇『德』的过程。老子所开创的这一自然无为的道家思想，在战国时期的庄子那里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庄子进一步发展了这个以『道』为最高行为准则的道家理论。庄子认为，人生真正应该追求的境界是『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后世把以老子和庄子关于『道』的学说为宗旨的派别通称为道家。

老庄和道家

道家学派的创始人是老子。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号老聃，约为春秋末期人，其生卒年份已经不可详考。相传老子曾做过周王室史官，他还曾和孔子讨论过『周礼』。但面对着礼崩乐坏的争霸局面，他与孔子的积极有为精神相反，主张无为而治。老子认为天道本来就是『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老子》三十七章）的，因而人之『德』作为对『道』的遵循，也必须无为。因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而自然是无为的。因此『惟道是从』（《老子》二十一章）的人类也应该『自然』、『无为』。

正是因为恪守『自然』、『无为』的信条，老子不仅创立了崇尚自然无为之学的道家学派，而且他本人在认为继续为官已显得『不自然』的情形下毅然辞官不做，成为被《史记》称为『隐君子』的隐者。

在中国哲学史上，道家的学说通常又被称为『黄老之学』。从文献记载看，早在秦汉之际就有『黄老学派』一说，以黄帝和老子并称来说明道家思想源于上古时期的黄帝。其实，这只是后人的一种假托。就道家思想的奠基来看，其开山著作只能是《老子》。

一书。这是先秦时期一部思想深刻、特色独具的经典著作。

《老子》一书大约只有五千字，它围绕『道』和『德』的关系系统地阐述了道家的思想，后来人们也习惯把它叫做《道德经》或《五千文》。因道家崇尚《老子》一书中的『道』和『德』，西汉的司马谈在《论六家之要指》中开始称其为『道德家』，只是在《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汉书·艺文志》里才正式称其为道家，并被列为『九流』之一。

有必要一提的是，东汉创立的道教与道家的关系。由于道教思想的精神内核离不开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哲学，道家哲学的主要思想也基本被贯穿于道教之中；道教还奉老子为教祖，尊称老子为『太上老君』，并将他的《道德经》和后来的《庄子》（道教称其为《南华真经》）作为主要经典之一。因此，后人一般也把道教归入道家之列。

继老子之后，在中国古代有许多思想家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思想，如杨朱、宋钘、尹文、彭蒙、慎到、田骈等，他们大多游学于战国时期各学派荟萃的学术中心——齐国的稷下学宫，以老子的『道法自然』为最高信仰。人们通常称其为『稷下道家』。

但是，在老子之后的思想家中以庄子最为著名。与孟子大约同时代的庄子在道家历史上之所以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因为博学好辩的庄子不仅进一步发挥了老子『道法自然』和自然无为的思想，而且在自己的人生活动中处处遵循这种无为逍遥的生存方式。《史记》中曾记载有庄子拒绝楚王聘其为相的故事。

所以，后世一般把庄子视为是继老子之后道家最重要的人物，因为是他集先秦道家思想之大成，并在他那个时代把道家的影响迅速地传播开来。庄子的思想具体体现在《庄子》这部文约义丰、诙诡谲奇的著作中。在这部被后来的道教奉为经典的书中，庄子以其非常生动形象的语言，探讨和阐述了许多颇具深刻性的道理，进一步发展了老子的『道』，使道家思想更加完备。事实上，继老子之后，庄子的学术思想对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后人也把道家思想简约地称为『老庄之学』。

从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看，老子作为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其最大的贡献在于建立了一个以『道』为基础的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并由此出发，老子还明确反对儒、墨在道与德的问题上注重人道，强调教化的观点。因为在老子看来，人类社会的道与德无非是对天道的一种顺从，『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而自然本身是无为的，但这种无为却又是『天网恢恢，疏而不失』。（《老子》七十四章）所以，老子讲的无为其实又是一种无为中的有为。老子认为，人应效法这种高明的『无为』。

为使他的『无为』理想更具有说服力，老子还进一步论证了不自然的『有为』对人生的危害。在老子看来，违背自然的『有为』总带给人许多失败和烦恼：『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老子》六十四章）因此，『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老子》四十八章）所以，老子甚至声称人类应复归到婴儿的状态：『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老子》二十八章）因为婴儿是自然无为的，因着这种无为，所以婴儿是最有德的。

为了达到这种『无为』之境，老子还探讨了基本的方法论原则：『我有三宝，持而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老子》六十七章）

由此可见，老子在这里宣称的是一种自然无为的人生境界，人生至道被理解为『无为而无不为』。由于任何道德追求中的仁义或兼爱均属人为，因而在老子看来，儒、墨两家虽然是『显学』，但是它所倡导的都不是理想的人生境界。所以，老子反对仁义、智慧、孝慈、忠臣等伦理纲常，认为『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老子》十八章）

道家的这一无为理想发展至战国时期的庄子而集其大成。

庄子直接继承了老子的思想，明确认为善恶皆『有为』，故皆有所累。在庄子看来，『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庄子·养生主》）所以，庄子明确认为为善与为恶皆为『名』、『刑』所累，唯有『自然』、『无为』才构成人生的最高理想境界。

而且，在庄子那里，『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这种无己、无功、无名的理想人格事实上也是庄子自己身体力行的人生最高准则。《史记》中记载的庄子拒聘为相的故事典型地反映了道家的这一无己、无功、无名的理想人格追求。

因为推崇一种自然无为的人生境界，道家自然主张人生应当无欲，它认为不自然的、刻意的欲望是危害人生的。以老子的话说就是：『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老子》三十七章）当然，老子也无法否认人从根本上讲是有欲的，所以，他又声称『无欲』乃是指导人应自然地对待欲望，要知足常乐，使欲望降低到最小的程度：『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老子》四十六章）庄子也主张人生应当无欲。他认为『其耆（嗜）欲深者，其天机浅』。（《庄子·大宗师》）由此，庄子主张『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庄子·马蹄》）显然，道家的素朴无欲说，是以其无为说及天人合一的理想为其

理论基础的，也是其无之人生理想的必然反映。

也因为推崇一种自然无为的人生境界，道家在生死问题上持『生死齐一』的自然达观心态。譬如在庄子看来，生死无非是自然之变化：『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庄子·大宗师》）所以，庄子认为一个人必须对死采取超脱的态度。『夫大天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庄子·大宗师》）尤其独特的是，庄子还提出了生死齐等的观点：『胡不直使彼以死生为一条』（《庄子·德充符》）；『孰能以无为首，以生为背，以死为尾，孰知生死存之一体者？』（《庄子·大宗师》）可见，庄子认为对生死必须有『不知说（悦）生，不知恶死』（《庄子·大宗师》）的洒脱超然之心境。也因此，在《庄子·外篇》中有了庄子妻死，而庄子鼓盆而歌的记载。庄子及道家学派对生死问题的论述显然充满了『道法自然』的睿智。

魏晋时期，老庄的这一自然无为思想又再度兴起。特别是这一时期的无为思想与玄学相结合，使『无为』的人生至道理论蒙上了玄秘的色彩。

这一时期『无为』说的推崇者主要有王弼、阮籍、嵇康、向秀、郭象等人。这些思想家们不仅在理论上阐发了自然无为的学说，而且还在自我人生实践上孜孜以求，乐此不疲，形成了后人称之为魏晋风度的人生态度。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胡适曾经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古代思想史》。在胡适的讲义中，他曾经对道家的主要思想作了如下三个方面的概括：一是自然变化的宇宙观；二是善生保真的人生观；三是放任无为的政治观。这可以说是对道家思想非常精当的概括。

如果说先秦时期以老庄为主要代表的道家因愤世嫉俗而远离政治，着重于追求内心自由、清静无为和返朴归真，那么，汉初的道家则因循自然，开始干预政治，在兼容并蓄和博采众长中，从『无为』中寻求『有为』，从而开始得到了统治者的认同和推崇。

秦亡汉兴，以刘邦为代表的汉帝国的创立者大都来自社会下层，因此，简便易行的道家思想更容易得到他们的青睐。这就是黄老之学在汉初得以昌盛的直接原因。西汉前期，相国曹参就采用了盖公的黄老之术来治理国家，得到了君臣百姓的赞美。到了汉文帝，他也非常崇尚黄老之说，主张以『清静无为』的方式治理国家。史书里还记载，因窦太后也『好黄老之言，不说（悦）儒术』，汉景帝及太子（即后来的汉武帝）也都『读黄帝、老子，尊其术』。（《史记·外戚世家》）我们也许可以说，被后人称之为『文景

之治』的繁荣，与汉文帝和汉景帝时期所采取的清静无为的治理之道不无关系。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道家思想由此开始走向潜隐的发展之路。事实上，即便在『独尊儒术』的汉武帝时期它也没有消失，而是在寻求新的发展路径。所以，大致到了东汉时期，道家开始分化，一方面向神仙方术和神秘化方向发展，形成与佛教抗衡的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一方面与儒家的纲常名教相结合，形成道家思想的新形式——魏晋玄学。

这一时期值得一提的是道教的创立。

从有确切的史料记载来看，最早出现的道教组织应该是『五斗米道』和『太平道』。东汉顺帝时，张道陵（又称张陵，即后世被民间尊为张天师者）在四川首创五斗米道。据《华阳国志》记载：『汉末，沛国张陵学道于蜀鹤鸣山，造作道书，自称「太清玄元」，以惑百姓。陵死，子衡传其业。衡死，子鲁传其业……以鬼道教。……其供道限出五斗米，故世谓之「米道」。』汉献帝时，道教领袖张鲁归降曹操。由此，五斗米道得以流传后世。这就是道教历史上著名的『三张』，即张道陵、张衡、张鲁。此派教徒又尊张道陵为『天师』。

道教起源中的另一支为汉末黄巾农民起义领袖张角创立的『太平道』。张角因信奉黄老之道，奉《太平经》为经典，所创立的道教被称为『太平道』。据《后汉书·皇甫嵩传》说：『张角畜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张角后来发动了农民起义，但遭到统治者镇压。『太平道』也由此而转入地下于民间流传。

五斗米道和太平道的出现，标志着道教已形成了以共同信仰为维系的群体组织，成为名副其实的宗教。五斗米道和太平道信奉的主要经典有《道德经》和《太平经》，这是道教最古老和最基本的经典。

两晋时，政治腐败，社会动荡，一些士大夫精神空虚，由此而追求神仙信仰。这种追求的结果是：一方面给道教注入了更多的理性因素，进一步丰富和充实了道教的教义，使这一中国的本土宗教日臻完善。另一方面也在道教中增加了许多维护封建伦理道德的内容，打上了士大夫阶层的思想印记。

汉魏之际社会动荡不安也为道家以魏晋玄学的形式重新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

魏晋玄学以复活老庄思想来取代汉朝曾经一度非常流行的谶纬神学，其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嵇康、阮籍、向秀、郭象等。这一时期的玄学家们把《老子》、《庄子》和《周易》并称为『三玄』，以他们理解的老庄思想来注释儒家的经典，形成了『儒道兼

容』的思想格局。同时，他们用恬淡自然的人生态度去拯救被儒家名教压抑的人性，力图摆脱儒家所崇尚的繁文缛节的礼教束缚，追求一种超脱放达的人生。可见，道家思想从它的产生到魏晋时期，经历了无数次政治风云的变幻和许许多多的考验，在这一时期尤其表现出一种遇险不惊、临危不乱、从容淡定的处世智慧的生活态度。

到了唐宋时期，统治者给了道家更尊崇的地位。

史书记载，老子姓李，正巧与唐代皇室同姓。于是，唐统治者为了抬高自己的出身，便自称是老子的后裔。先是唐高祖重新规定了三教的次序，把道家排在儒、佛之前。紧接着是唐高宗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并下令贡举人士必须兼通老子的《道德经》。唐玄宗更是不遗余力，他直接把道士当作皇族宗室的本家，又是在全国兴建玄元皇帝（即老子）庙，又是接二连三地尊封道家名士，建道院，设玄馆，置生徒，习老庄，并亲自注释《道德经》，诏令百姓必须家藏一本，以推广道家思想，不断提高道家学说的地位。唐武宗刚刚即位，就把传说中的二月十五日老子诞辰定为『降圣节』。更有甚者，唐代不少帝王还都热衷于服食道士所炼的金丹，以求长生不老。但是从史籍记载看，不仅没有一个皇帝长生不老，到头来反倒因服食金丹中毒而过早地结束了性命，唐太宗、唐武宗和唐宣宗等皇帝都是如此。

宋代统治者也仿效前朝做法，想方设法与道家联宗，宋徽宗甚至还曾经诏令僧尼改穿道服。

正因为这样的历史背景，唐宋时期便成了道家、特别是道教发展的鼎盛时期。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向来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即便是在极力与道家认祖联宗的李唐王朝，统治者实行的仍然是儒、道、释三教并用的政策。到了宋代之后，儒学的新形态——宋明理学的兴起和不断发展，又重新形成了儒学一统天下的思想格局。特别是后来的清朝统治者采取重佛抑道的政策，终于使道家的地位日渐下降。

但是，尽管如此，在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大系统中，道家思想的地位和作用依然是不容忽视的。如果像一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文化思想也有刚柔之分和显隐之别，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说，儒道两家相比之下，儒家的刚健、有为、进取、入世的刚性精神表现得比较突出，道家则偏重于柔顺、无为、退守、潜隐的柔性精神。事实上，中国历史上道家的思想一直以退守、潜隐和柔性方式存在并影响着中国人的人生态度和为人处世的智慧。

儒道互补的中国传统文化

儒道两家思想，一个刚健有为，一个因循自然；一个入世进取，一个潜隐退守。但这正是他们达到相通和互补的前提条件。

因为它们构成了人生一面两体的平衡智慧。所以，许多中国古代许多文人往往入世为儒，出世为道，或者熔儒道于一炉，张弛相济，进退自如。

其实，儒道互补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春秋战国时代，随着奴隶制度逐渐解体，古代中国进入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一部分奴隶主贵族逐渐失去了他们原有的经济和政治上的特权地位，沦为贫民或者奴隶。其中一部分人结草为庐，结伴而耕，避世隐居。《论语》中把他们叫做『逸民』或『隐者』。这些人对弱肉强食、离乱痛苦的现实社会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所以和孔子、孟子、墨子等人一样，他们共同痛斥『天下之无道』。但是，置身在这同样的时代条件下，儒家和道家却走着两条不同的道路。

儒家直面现实社会，力求探索一条改造外部现存世界的道路，即便是强调个人的修身养性，最终也是为了治国平天下。所以孔子认为，他与那些逸民、隐者的区别就在于『无可无不可』（《论语·微子》）。用孟子的话来解释，就是：『孔子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这正印证了孔子一向的人生主张：『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而且，《论语》的记载来看，实际上不管天下『有道』还是『无道』，孔子似乎没有一点退隐的意思。事实上，为了改变这个『无道』的世界，尽管他四处碰壁，却百折不挠。当时就有人评价孔子是一个『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的人。

在这方面，孟子比孔子也毫不逊色。在孟子看来，无论得志还是不得志，无论人生困厄还是显达时，都不应该潜隐遁世，而应该积极用自己的方法来『平治天下』，实现其『王道』理想。孟子曾经放言『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孟子在这里不仅毫无退隐之意，相反，恰恰体现了儒家文化一种『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的豪气。

但是，道家面对残酷的现实，却主张回到自身的心灵深处，从『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中寻找一条自我拯救的生存之道。

据《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记载，老子本人就是一个『隐君子』。相传他在周朝做过『史官』，孔子曾向他问『礼』，后来他却退隐了，骑青牛出关时留下《老子》一书，绝尘而去。庄子也曾做过宋国漆园的管理员，归隐后表示『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所以，庄子宁肯隐居陋巷，借米充饥，自编草鞋，过着清苦的生活，也不愿应楚威王高薪聘请而赴楚相之位。从老子的自然无为、少私寡

欲、贵柔守雌的思想，到庄子的无己无功无名、逍遥放达的精神境界，无不说明道家与儒家的不同之处。

事实上，道家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固执地守护着人的精神的尊严，辛勤地开垦着自我精神世界的荒漠，把人生从无法消除的痛苦和灾难中拯救出来。它教人超越人生困境和世俗情欲，使自我获得一种宁静、自由和恬然的心境。老庄的这一人生智慧对处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纷乱世道的人们显然是很有吸引力的。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老子和庄子都是隐士，但他们又不同于一般的隐者。他们的退隐不单单是为了规避无法改变的社会现实，也不仅仅是为了避免为虎作伥、助纣为虐，更重要的是为了寻求一种超越现实的精神自由。

有学者认为，或许正是因为老庄追求超越现实的精神自由这一缘故，道家在韩非子的『显学』排行榜上终于名落孙山。事实上，老庄的思想在当时还是有相当影响的。而春秋战国时代所涌现出来的大批隐者的现实生活，以及以老庄为代表的的知识分子对隐者生活的亲身体验，正是道家思想产生的社会基础。

孔子和孟子则远离隐者的生活体验，因而，他们的思想历程必定不同于老子和庄子。所以，后世学者尤其是儒家往往误读老庄。战国末期的思想家荀子在总结先秦各学派思想过程中，在其《解蔽》中谈到庄子时曾指出：『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意思是说，庄子只重视代表自然的『天』，因此而忽视了『人』，即用自然掩盖了人生。荀子进一步指出，像庄子这样来理解『道』，那只能是人对自然的一种因循依顺，而无法战胜自然。其实，荀子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面，而问题的更重要的一个恰恰是，庄子沿着老子『道法自然』的思路，对人的精神自在和自由作了极为有益的探索，从而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把人对自身真实本性的认识大大地向前推进了。

当然，我们有必要指出的是，从人生之『有为』与『无为』的辩证关系来看，儒道互补才是真正的人生『至道』境界。

也因此，我们可以发现，从道家的发展历史来看，那些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思想家无不主张儒道互补。

南朝的葛洪、陆修静、陶弘景和北朝的寇谦之等就是这样一批颇有建树的道士。葛洪自号抱朴子，是南朝著名的道士、炼丹家和医学家。葛洪明确主张以神仙养生为内，儒术应世为外，所以他极力将道教的神仙信仰和儒家的纲常名教结合起来，提出了『道本儒末』的思想。葛洪的思想由于调和了儒道两家，对道教理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死后不久，就被尊为『葛仙翁』，使其在道教中的地位与创教者张道陵、张衡、张鲁相提并论，《抱朴子》也因此成为道教的主要理论著作。陆修静的主要功绩则在于广罗道经

一千二百二十八卷，并加以鉴别整理，奠定了《道藏》的基础。此外，他还吸收佛教的修持仪式，补充完整了道教的斋戒仪范，形成了『南天师道』。陶弘景作为南朝齐梁时道教最著名的学家，继葛洪的《抱朴子》之后进一步发展了道教的教义及哲学理论，其思想脱胎于老庄哲学与葛洪的神仙道教，并杂有儒和佛的观点。他主张儒、释（佛）、道三教合流，是道教史上主张三教合流的思想先驱。寇谦之是北魏时期的道士，在统治者的大力扶持下，他将早期道教逐渐吸纳进了儒家忠孝仁义的道德规范，创立了『北天师道』。

隋唐时期是道教的一个大发展时期。正如前已所述，唐朝建立不久，李姓统治者为了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自称是道家学说的创始人老子李聃的后代，所以对道教倍加推崇，使道教在唐代得到了很大发展。这种发展直接为辽金之后道教分宗立派奠定了基础。

辽金时代，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南北对峙，道教则出现了不同的宗派，主要有五大教派。其中以正一派与全真派最为著名。而这两个教派无一不倡导儒道互补。

正一派渊源于东汉末年由张道陵创立的五斗米道，此派尊其祖张道陵为『常教』和『正一天师』，因此『五斗米道』又称『正一道』或『天师道』。因主要在南方传播，亦称『南方道教』。全真派则由王重阳在山东宁海（今牟平）全真庵创立。它宣扬『澄心定意、抱元守一、存神固气』为『真功』，『济贫拔苦、先人后己、与物无私』为『真行』，要求道徒『功』、『行』俱全，故名『全真』。其理论的基本特征是主张儒、释（佛）、道三教合一。所以，王重阳竭力主张『三教同源』、『三教归一』，他要求自己的道徒以『太上为祖，释迦为宗，夫子为科牌』，劝人诵奉道教的《道德经》、《清静经》、佛教的《般若心经》和儒家的《孝经》。以他的话来说就是『心中端正莫生邪，三教搜来做一家』。王重阳的七大弟子之一丘处机因受成吉思汗召见于雪山，面陈清净无为的治国之道，曾经倍受元统治者的尊重，死后被元世祖忽必烈封为『长春演道主教真人』。他开创的全真龙门派在中国道教历史上影响极为广泛。

史家常称秦汉之后无『纯儒』，我们同样也可以说，秦汉之后无『纯道』。事实上，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既互相排斥，又互相吸收；既互相对立，又互相融和。在中国文化史上，儒道两家恰恰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在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不可或缺和赖以互补的两个方面。

在此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说，儒道本是一家。因为对于中国传统来说，他们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所以，

即便是在儒学一统天下的时期，道家思想也并没有泯灭，它以各种形式渗透到儒学乃至佛学之中，渗透到现实生活各个方面，在无形中影响着中国人的人生态度。

这正体现着道家思想中自然潜隐的生存智慧。

道家智慧的当代价值

一八四〇年爆发的鸦片战争，让闭关锁国沉醉于『惟我华夏独尊』的国人领教了船坚炮利背后西方文化的厉害。从这个时刻起，对传统文化的怀疑乃至否定便几乎是近代中国一种历史的必然。而『西学东渐』则是这种历史必然性的自然衍生。

于是，『西化』的主张甚至由此而成为近现代中国历史上一个挥之不去、却之又来的时尚话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与儒家一样，道家文化的衰弱境遇自然是不可避免的了。

但是，值得深思的是，此时的西方社会则逐渐对中国古代道家传统文化表现出一种空前的认同甚至欣赏的心态。

有『世纪智者』之誉的英国哲学家罗素不仅看到中国古代文明的历史价值，而且认识到中华古代文明的现实及未来的存在价值。他曾这样意味深长地说过：我们西方文明的显著优点是科学的方法；中国人的显著优点是对生活的目标持一种如老子讲的『自然』的正确的观念，人们必将期望这两种因素能真正逐渐结合起来，否则，人类的前途是令人忧虑的。（《罗素文集》，改革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第三十六页）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哥本哈根学派代表人物玻尔，在其访问中国后发现，他自以为最得意的科学创见——互补思想，其实早已由中国古代的道家的『太极图』所昭示。而且，玻尔发现，中国古代道家的阴阳相生相胜、相反相成思想对解决当代物理学难题是如此的重要。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对道家阴阳思想的认同和欣赏心态，玻尔甚至为自己设计了一枚徽章，在椭圆形图案中心绘着醒目的太极图。他还以此作为自己家族的『族徽』。

英国著名的科学史家李约瑟更是明确表示自己在信仰上皈依于道家，他自称『荣誉道家』，自号『十宿道人』。李约瑟为了表示对老子的尊重，还特意替自己选了个与老子相同的中文姓——李。李约瑟曾这样评价儒家与道家：『后来的儒家思想变得僵化成一个经院哲学的东西，而道家反对他们的那些主张。……许多科学史家发现，炼丹术起源于道家的巫术，探求长生不老药。』他还说：『说道家思想是宗教和诗人的，诚然不错；但是它至少也同样强烈地是方术的、科学的、民主的，并且在政治上是革命